

餐桌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王辉

我国素以物产富饶著称于世界,不过如今餐桌 上常见的食材中确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舶来品"。中 国历史上的外来作物大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隋唐 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主要传播途径,宋元以后海上 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渐显著。在中西交流发展的视野 下,外来作物的引入主要集中在4个历史时期:汉晋 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

汉晋时期:域外饮食文化的首次 大规模引进

无可争辩的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引进域 外饮食文化始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张骞两次出 使西域,历时30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被 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这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外交 家、冒险家,也是丰富中国人餐桌的最大功臣。由于 张骞的"凿空",汉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正式开始建立, 很多异域蔬果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原腹地。这些蔬 果大大丰富了我国的食物种类。据史料记载,张骞通 西域之后传入我国的主要蔬果品类有胡蒜、胡荽、胡 瓜、葡萄、安石榴等。这些蔬果品类至今仍是我们餐

胡蒜(大蒜)。蒜因味辛辣而被汉代人归入"荤 菜"之列。汉代的蒜有大小蒜之分。小蒜是中国本土 所产之蒜,而大蒜则来自西域,又名"胡蒜"。成书于 西汉后期的《急就篇》,将大蒜列入蔬菜类别,可见大 蒜在西汉后期已经占据蔬菜圈的重要位置。据《太平 御览》记载,东汉时期的兖州刺史李恂和扬州刺史费 遂都曾督办过胡蒜的种植,这可能说明胡蒜的大规 模种植可能在东汉时期。

胡瓜。胡瓜即今日的黄瓜,其原产地是印度。秦 汉时期,将外来蔬菜多冠以"胡"名,唐以后才改称为 黄瓜。黄瓜富含维生素 C 以及有助于人体对蛋白质 吸收的蛋白酶,所以它也是汉代人喜食的蔬菜之 一。江苏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和广西贵县汉墓都曾 出土过黄瓜籽,但奇怪的是,汉代文献资料没有提 到它,可能黄瓜的种植在当时尚不普及。汉代以 后,黄瓜的种植普及开来,《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详 细的"种胡瓜法"。

胡荽即芫荽,今日所谓的香菜,原产于中亚地 区。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曾多次提及胡荽的 食用禁忌,这说明早在张仲景之前,胡荽的食用就已 普及,人们对其食用禁忌有了很深了解。据史籍记 载,五胡十六国时期,石勒讳"胡",因此,胡荽又得名 为"香荽",这一得名应与胡荽的独特气味相关。贾思 勰《齐民要术》详细介绍了胡荽种植的时令和方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现场。

还记载了胡荽的两款食法,分别为"作胡荽菹法"和 "胡羹法"。前者是胡荽为原料制作的腌菜,后者是以

葡萄是汉晋时期最重要的舶来果品。在汉代引 入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葡萄之 前,古人食用的主要是产自本土的野生葡萄。葡萄的 外来品种与本地品种通过杂交,培育出适合我国水 土条件的优良品种,如龙眼、马乳、鸡心等,从而形成 了我国葡萄的独特风味。东汉末年,曹丕就认为葡萄 是"中国珍果";据《酉阳杂俎》记载,到了南北朝时 期,长安一带的葡萄已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了。

石榴原产波斯及印度西北部,汉晋人称之为丹 若或安石榴,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中叶李尤 的《德阳殿赋》。赋中说德阳殿的庭院中"蒲桃安若, 曼延蒙笼"。南北朝时期,中国已培育出了优质石榴。 《洛阳伽蓝记》说当时洛阳白马寺所产"白马甜榴,一 实直牛",可见其名贵程度。除了直接食用外,安石 榴还用于烹饪。《齐民要术》所载"胡羹"的制作,即以 安石榴为调料。

隋唐时期:引进范围延伸到印度 和地中海地区

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 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外交通频繁,饮食文化交 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汉晋时期相比,隋唐时期 作物引进的特点是进一步扩大引进的地域范围,延

伸到了印度和地中海地区。

西瓜是这一时期引入的最重要的水果品类。西瓜, 又名夏瓜、寒瓜,原产非洲。关于西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此前有学者认为是在汉代,但此说法缺乏论据难以成 立。西瓜最早见于五代文献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 汉旗1号辽墓的壁画中,主人面前桌上的果盘里就摆放 着西瓜。这说明,西瓜由五代传入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

文化周刊-国学

至于菠菜,据《新唐书·西域列传》记载,贞观二 十一年,(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棱、酢菜、浑提葱。泥 婆罗国贡献的蔬菜中,最重要的当属波棱(菠菜)。由 于菠菜的原产地是波斯(今伊朗),唐代道教方士把 它叫作波斯草,说它可以解除服食丹石后带来的不 适感,因而在唐代,菠菜还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菠菜从伊朗移植至尼泊尔然后再移植到中国,反映 出世界历史上农作物移植过程中渐进的特征。

胡椒是这一时期传入的最重要的调味料。胡椒 原产印度、东南亚,其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已不可 考。晋代《博物志》中载有胡椒酒的制作方法,可见其 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晋代。胡椒传入时,被视为 良药。在唐代,胡椒依然是贵重的奢侈品,有"黑色黄 金"之称。《新唐书·元载传》记载说唐代宰相元载骄 横恣肆,贪得无厌,被唐代宗诏赐自尽后,从其家中 搜出的胡椒竟多达800石。

宋元时期:海陆并进的外来食材输入

宋元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指南针的使用

唐代海 兽葡萄纹铜 镜,洛阳博物 馆藏。 视觉中国供图



辽墓壁画 中的"西瓜"。 作者供图

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一改汉唐以来以陆路为主的对 外交流,变为海陆并进。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 开辟和延伸,商船往来不断,贸易活跃繁荣。中国与 东南亚和南亚广大地区的官方交往、民间交流都较 以前有所发展。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各种外来食材 接踵而至。这一时期引进的外来食材中主要有占城 稻、绿豆、胡萝卜等。

占城稻是一种早稻,因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 部)而名。古代先民虽然很早就驯化了水稻,但本土 的水稻品种对于种植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比如北 方的水稻品种多是粳稻,淀粉含量高,但对土壤肥力 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南方土地较贫瘠的山区很难栽 种推广。而传统的籼稻则喜温耐瘠,不耐低温。占城 稻是越南人民培植起来的一种优质稻种,具有耐水 耐旱、适应力强、生长周期短的优势,因此在宋代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环境较为恶劣的江南 丘陵地带也能够大规模种植占城稻,这大大提高了

绿豆,《齐民要术》中已载有绿豆之名,但有学者 认为这种绿豆可能只是小豆中皮色稍绿的那一种,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绿豆。文献记载表明,北宋时 期中国从印度引进了一种产量较高籽粒较大的绿豆 品种。绿豆传入后,很快成为南北方的寻常作物,种 植范围不断扩大。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的绿豆食品, 如绿豆水、绿豆粉和绿豆芽等。

胡萝卜,胡萝卜原产欧洲,《本草纲目》中有"(胡 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的记载,也有学者认为胡萝

卜传入中国的过程堪称"一讲宫"。张骞出使两域带 回了诸多异域物产,其中也包括胡萝卜,只是那时的 胡萝卜品种较为原始,根茎又细又不好吃,所以并没 有被发扬光大。宋元时期,胡萝卜再次登场,尤其是 元代蒙古人的饮食习惯给了胡萝卜足够的表现机 会,在元代最重要的农书《农桑辑要》中,胡萝卜正式 作为蔬菜"出镜",从此胡萝卜便一路高歌猛进,成为 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之一。

明清时期:数量最多、影响最深的 美洲作物引种

在中国历史上引进作物品种数量最多、影响最 为深远的当数明清时期引种的原产于美洲的作物, 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 茄、西葫芦、佛手瓜等。

玉米,又称玉蜀黍、番菽等,其适应性强,耐旱, 管理简单,产量比一般旱作粮食要高。作为粮食,玉 米要比米和面粉耐饥,这对广大百姓而言尤为重要 而且玉米的籽粒、秆、叶亦可用来做饲料。所以,玉米 的引种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甘薯,又名红薯、番薯、地瓜等,其特点是产量 高,适应性强,病虫害少,适宜在山地、坡地栽种,除 了供日常食用之外,还可制糖、酿酒、制粉丝等。明代 大科学家、宰相徐光启曾作《甘薯疏》,倡导各地推广 甘薯种植。随着甘薯易种和高产的特性逐步为世人 所知,再加上清乾隆时期人口的激增,促使甘薯的种 植面积越来越大。因此,清代很多地方志中,均有关 于甘薯的种植以及以甘薯作为备荒之用的记载。

番茄,又名番柿、番李子、西红柿等,番、西都是 外国的意思。因其形似茄或者李子,故名番茄、番李 子,又因形似木生红柿,而品种来自西方,故得名西 红柿。据文献记载,番茄在明代后期已引种至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番茄最初是作为观赏性园艺植物出 现的,并没有被划入食用蔬菜范畴。

辣椒,又名番椒。我国最早关于辣椒的记载见于 明代史籍,有趣的是,辣椒和番茄一样,在传入中国 的初期,也是被当作观赏植物。汤显祖在《牡丹亭》 里提到了一户富贵人家后花园里的40种花卉,其 中一种就是辣椒花。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这款神 奇的外来辛菜竟有增进食欲、促进血液循环、散 寒除湿等诸多益处。更为重要的是,辣椒的刺激性 辛香可以给饮食增添美妙的风味,对中国烹饪文 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辣椒传入后 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饮食革命。从此,中国传统五味 体系中"甘酸苦辛咸"变成了"酸甜苦辣咸"。如今 的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辣椒大国,产量和消费 量都居世界第一。

要言之,在人类发展史中,国家、民族、地区之间 的物产交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 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的土地上曾引进栽培了许多 来自域外的农作物品种。这当中大多数的作物被长 久地流传了下来,成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还有一小 部分作物则是昙花一现,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外来 农作物的引种,不仅丰富了食材的种类,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还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饮 食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 邰谧侠(Misha Tadd)

今年是我接触《道德经》的第三十年,有机会参 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录片《中国智慧·老子篇》 拍摄,似乎也暗示我在《道德经》上的努力走向"而 立",这让我兴奋。同时,我又是旁观者,站在纪录片 之外,好奇地看着不同背景下的各种与老子之"道"

纪录片里的对话者来自全球不同地方,有我的

本科老师、汉学家万百安教授,有支持我成立南开大 学"全球老学"研究中心的陈鼓应先生,还有哈佛大 学著名教授普鸣等。这些学者指出了《道德经》和当 时文化环境相比的独特性,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等。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说道家提出了新的道 物关系,就是万物由道所生,万物平等;普鸣也认为 老子重新解释了"道"与"德","德"指与周围的一切 建立良好的联系,这种新的解读吸引了语言不同、时 代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的人。

《道德经》在当代的广泛传播与时代有关。在过 去的几百年里,现代科学大力发展,人类征服了自 然,但也带来了"现代病",老子教我们建立与自然、 与他人的新型关系,还让人在自己内心与外界世界 中也建立新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时,"无为"是最重

"无为"教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如,纪录片里 的热电站不是燃烧有限的资源,而是"无为",安安静 静地接受太阳不断提供的能量。"无为"还教人类自 身和谐相处,不要去掌控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院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说道家要"长而不宰",让人实

美国有很多书将这种思想应用到管理上,影响 最大的大概是约翰·海德(John Heider)的《领导之 道》(The Tao of Leadership)。它一章章解释《道德 经》的智慧如何用于领导,非常通俗,但被引用达 600多次,被翻译21次,包括两个汉语回译本,而且 还在增长中。更通俗的是各种写人与人相处的,像夫 妻之道、父母之道、恋人之道等,都是让自己与对方



2000年前的老子为什么成为今天的"全球偶像"

但"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注重方法,顺应 形势,能够"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李小龙、 电影《功夫熊猫》,都是西方人所熟悉的"无为"英雄。 在纪录片里,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利克斯·麦克劳德 不仅拿李小龙做例子, 还说自己习武就是将动作练 习到能自然作出反应。他提议将《道德经》视为"自 助"类书籍,帮助人们利用"无为"和"阴"的价值。

万百安说老子将柔弱想象成水,善于根据外界 改变形状;普鸣说林肯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 题,可谓道家的贤人。1983年,本杰明·霍夫(Benjamin Hoff)出过一本著名的道家哲学普及读物。其 中,小熊代表有道家思想的人,看起来傻乎乎的,却 总在无意中做成事情。教人们遵循"道"的书还有很 多,它们经常用"The Tao of"来命名,像工作之道、 锻炼之道、教育之道,等等。

老子之"道"不只是工作原则,对片中来自德 国汉堡的吉他手雷蒙德·伯克来说,"道"还是心 灵的慰藉。他本来是吉他手,手指因意外失去了 感觉,阴差阳错跟着著名的陈氏太极老师史杨练 习太极拳,他觉得是太极拯救了他。披头士的歌很 狂热,但歌词《道德经》"不出户,知天下"让人感觉

传播《道德经》谧宁价值的相关书籍在西方也非 常多,像和谐之道、幸福之道等,最有影响的是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改变 思想,改变生活),这本书让人们改变过多追求外界 财富、地位、教育的想法,就能让生活发生改变,变得

老子之"道"的力量影响了一大批人,20世纪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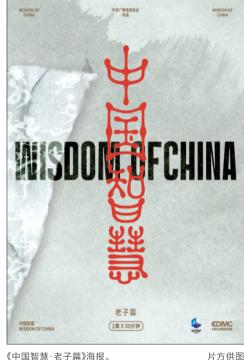


河南省灵宝市的小学生正在学习《道德经》。



纪录片《中国智慧·老子篇》主持人、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 安(Bryan Van Norden)在老子像前。

年代,美国有些人想要回归大自然,老子的"道"就满 足了这种需要。我父母在十几岁时就接触到《道德 经》,而神奇的是,我自己初中时也意外发现了《道德 经》,就觉得看似简单的语句背后很不简单。后来我



片方供图 《中国智慧·老子篇》海报。

开始研究它,又无意中接触到《道德经》的大量译本, 并收集了世界上最多的《道德经》译本资料,这个过 程也是"无为"的。

可能有人会认为,《道德经》有这么多版本,中国

汉语中现代的和古代的就不一样,不同语种的译本 区别更大,它们与"原意"有了差异,就会形成"错 误"。但我反而认为,它们所用的词语、表达的思想, 与旧有版本仍有联系,同时又生成了新的思想,这正 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成果。

译本的增加也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老子学术研 究。很多著名哲学家,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很 欣赏老子的"道"。汉学家们更是从不同角度阐发自 己对"道"的理解,美国哲学家安乐哲就认为,道家 将世界理解为变化的而并非静止的,而且善于根 据社会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这可以改变笛卡尔哲 学追求抽象静止的传统,让人更关注现实社会。因 此,道家哲学的研究不只是中国哲学的课题,更是世 界哲学的课题。

译本和老子研究都让我认识到《道德经》的重要 性,因此我提出"全球老学"。这个概念在我发现有很 多译本时就开始孕育了,后来得到南开大学支持, "天时地利人和",成立了南开大学"全球老学"研究 中心。"全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研究对象包括"全 球"范围内的相应内容,二是指我们不能局限于某一 文化立场,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某一译本或者解释, 而应该采取"全球"视角,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

"老学"这一词,我翻译成Laozegetics,它包括对 老子的研究与阐释,但不是仅仅面向古代去寻找"正 确"而且内涵不变的文本,而是更多从历代和当代不 同人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和运用中,发现"道"的变 化及其对未来的启示。这会让"道"的意义越来越丰 富,就如《周易》所说的"生生不息"。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美国汉学家)

重返三国现场

丝绸之路上的《三国志》写本

近日,文明的融合"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 大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展览从全国十余 省区市精选了400余组文物展品,呈现了陆上丝绸 之路从长安、洛阳到新疆这一区域丰沛的艺术样貌。

□ 成 长

书·孙权传》残卷安静地平摊在展柜中。这是存世罕 见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 无独有偶,就在前年同一场馆展出的"文明的印 记——敦煌艺术大展"中,也展出了一份敦煌研究院 藏的晋写本《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残卷。作为"二十

四史"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不仅是汉

末三国历史权威的史料来源,其写本的流传也见证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

川南充)人,他生活于蜀汉晚期至西晋初年,师从蜀 中大儒谯周。陈寿在蜀汉官至观阁令史。蜀亡后,陈 寿入西晋,受晋武帝诏命编纂《诸葛亮集》二十四 篇,任著作郎,领本郡中正。其后,陈寿在官场屡遭谮 毁,仕途不济。

随着晋灭吴一统,陈寿成为三国时代落幕的亲 历者,也萌生了为三国作史的使命感。当时已有魏 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吴韦曜《吴书》等史书, 但均为一国视角,不能囊括三国之事。惟蜀汉"国 不置史,注记无官",好在陈寿本人是蜀人,得地利 之便。陈寿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撰写成《三国 志》65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的 才子夏侯湛已著《魏书》,知道陈寿写成《三国志》, 便将自己书稿毁掉。司空张华对陈寿赞誉有加,甚

陈寿在世时,《三国志》未得刊行。元康七年(297 年)陈寿病逝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上表朝廷, 称赞陈寿所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 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晋惠帝司马衷 诏令河南尹、洛阳令于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方得

陈寿《三国志》一经推行,其余诸史即归沉寂。 《华阳国志》评价"庶子考古,迁、固齐名",《晋书》评 价"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均将陈寿拟之于 司马迁、班固一样的一流史家。尽管《三国志》为私撰 史书,但在后世为历朝所认可,奉为正史。《三国志》 还成为后世平话、杂剧、小说等编讲三国故事的主要 素材来源。《三国演义》即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 基础上艺术再创作而成。

近世所见之《三国志》文本基本来自宋代刻 本,其中最早的为北宋真宗咸平国子监刻本,今 已不存。现存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 建阳本(绍熙本)等。宋本书籍的传世自然得益于 宋代印刷术的盛行。而在此之前,大量的古籍都 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数量稀 少、纸本不易保存等原因,这些抄本基本都散佚于 历史的长河中。

20世纪以来,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共计出土了6 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分别是:1909年在新疆鄯 善县发现的北魏高昌麹氏所抄《吴书·韦曜华覈传》 残卷,今藏日本;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的晋写 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今 流落日本;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安乐古 城)南佛塔遗址出土的晋写本《魏书·臧洪传》残卷和 《吴书·孙权传》残卷,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以及敦煌研究院所藏晋写本《吴书·步骘传》残卷。

这些残存的《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年代为晋至北 魏,而陈寿完成书稿约在西晋元康年间,两者之间相 距如此接近,说明《三国志》在成书不久,即受到士人 的热捧,不仅在中原广为传抄,还通过河西走廊流传 至敦煌、西域一带。西晋统一之后,社会经济得到较 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史称"太 康之治"。晋承汉制,继续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 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西域与中原的商贸交往也重 新活跃起来。迨至晋室南渡,在北方立国的前秦、后 秦、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与西域保持着持续的联 络。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商品的流转与交易,也伴随

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从《三国志》写本的流传可见, 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今甘肃西部和新疆一带传播速 度之快、影响之深。

古写本由于具有"近古存真"的特点,对《三国 志》传世本的研究和校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孙权传》残卷,高22厘 米,宽72厘米,残存41行,570余字。其内容为《孙权 传》中叙述建安二十五年至黄武元年部分,文字与今 通行本略有不同。其中,陆逊、于禁、鲁肃、吕蒙、张 辽、徐晃、张郃等三国人物姓名清晰可见。

东吴名臣陆逊在通行本《三国志》中时而作"陆 逊",时而作"陆议",其名未统一,令后世研究者颇为 困惑。清人周寿昌认为,陆逊可能本名"议",因宋时 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刻本遂更其名为"逊"。如今, 早于宋代的《三国志》晋写本明确书写了"陆逊"之 名,足见周说为误。考《三国志》诸书,"陆逊"当是陆 议晚年所改之名,因未能广泛流传于魏、蜀两国,故 此名多见于《吴书》,而《魏书》《蜀书》仍作"陆议"。出 土于陕西西安的魏《曹真碑》(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有 "冬霜于陆议"之字,可为旁证。

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 土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此件《三国 志》写本残卷使用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 良,很可能就是古代著名的"左伯纸"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在展览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三国志·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返:三国现场》 作者)